

## 《敕勒歌》研究

吕净植

[内容摘要] 《敕勒歌》是一首古老的敕勒族民歌,歌词经过敕勒语、鲜卑语、汉语多次衍变,最终记载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斛律金是《敕勒歌》的演唱者,非创作者。《敕勒歌》是敕勒族人民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敕勒歌 斛律金 敕勒族 鲜卑族

《敕勒歌》虽短,却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唐以后的诗词创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其词句的仿写,如,宋朝黄庭坚《题阳关图》:“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草低见牛羊”。金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历代诗话著作对其评价也较高,宋朝王灼《碧鸡漫志》:“吾谓西汉后,独《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清朝沈德潜《古诗源》称其:“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但对《敕勒歌》的族属、演唱者、演唱语言、演唱背景等问题,学术界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谈点个人的理解,就正于史界方家。

—

关于《敕勒歌》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最早提到《敕勒歌》的史书是成书于636年的李百药《北齐书》,稍后于643年成书的李延寿《北史》对《敕勒歌》演唱背景的记载与《北齐书》基本相同,但此两部官修正史都仅仅提到了《敕勒歌》的歌名,对其歌词没有记述。下至宋朝,记载《敕勒歌》的史书有《乐府诗集》、《资治通鉴》、《乐府广题》。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八六)是最早记载《敕勒歌》歌词的著作,作者把它收入“杂歌谣辞”之中。关于歌曲创

作的背景,《乐府诗集》则引自沈建的《乐府广题》。沈建是北宋初期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北宋中期人,郭茂倩则为南宋初期人。显然,沈建的《乐府广题》成书早于《资治通鉴》(1084)和《乐府诗集》,故《乐府诗集》所引《乐府广题》是现存的宋代最早记载《敕勒歌》歌曲创作背景的古籍。

关于《敕勒歌》的歌名,《乐府广题》记为《敕勒》,《资治通鉴》记为《敕勒歌》,虽有一字之差,但从两条文献所记载的主要内容及背景来看,应即同一作品。

以上提到的五种古籍对于斛律金与《敕勒歌》关系的记载可以分为三类。《北齐书》和《北史》称高欢“使斛律金敕勒歌”,可以理解为让斛律金演唱、创作或朗诵一首敕勒歌;《乐府诗集》和《乐府广题》作“使斛律金唱《敕勒》”,则比较明确地说是让斛律金演唱《敕勒》这首歌曲;《资治通鉴》则作“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即命斛律金创作《敕勒歌》。

文献中没有记载《敕勒歌》的曲调,而只记载了它的歌词,虽然由此推测,斛律金当年有感情地朗诵《敕勒歌》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乐府广题》记载:高欢听到后“自和之”,如果斛律金为朗诵,高欢的“和”就应该是由此创作另一首诗词,这

[作者简介] 吕净植 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讲师 吉林 长春 130012

显然不符合史书的记载,因此,高欢的“和”,我们只能理解为跟着哼唱,所以,斛律金当时是演唱《敕勒歌》,而不是朗诵。

史念海等人支持创作《敕勒歌》的说法,明显是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持演唱《敕勒歌》观点的有:《辞海》、《辞源》,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以及周蒙及永安<sup>①</sup>等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斛律金只是《敕勒歌》的演唱者,而不是创作者。

斛律金创作《敕勒歌》的说法目前仅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写作时可参考的书籍有《北史》和《北齐书》,他没有采用《北史》的说法,却根据《北齐书》某一补本“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的记载,将“唱”改为“作”。我们既未发现司马光有新的史料来源,也未在传世古籍中发现其他与《资治通鉴》相同的记载,显然,依据《资治通鉴》这一晚出的孤证来证明斛律金创作了《敕勒歌》,证据是不充分的。

从演唱背景看,《北齐书》卷一《神武纪》记载:高欢军队“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神武有疾”<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若让斛律金即兴创作,歌词的内容应该以鼓舞斗志为主,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敕勒歌》歌词却是描写草原雄浑辽阔的自然景象,以抒发对家乡山川的爱恋以及富足安宁的愉悦心情。故创作一说也与客观环境相矛盾。

就斛律金本人而言,据《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金性质直,不识文字。本名敦,苦其难署,改名为金”<sup>③</sup>。从原名敦字太难写而改名为金,可以看出斛律金文化水平较低,让具有如此文化程度的斛律金即兴创作歌曲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便他有一定的文学水平具备当场即兴创作的能力,仍无法解释后文的“欢自和之”。因为即兴作品,意味着创作之前没有人听过或看过,对于一首新的作品,高欢是不能跟着哼唱的。所以,斛律金创作《敕勒歌》的说法不能成立。

综上,斛律金不是《敕勒歌》的朗诵者和创作者,而是演唱者。

## 二

关于《敕勒歌》的族属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主要集中在它是鲜卑族民歌还是敕勒族民歌的问题上。在胡适《国语文学史》<sup>④</sup>、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sup>⑤</sup>,以及周蒙<sup>⑥</sup>等人的著作和论文中,都认为它是鲜卑族民歌。王盛恩<sup>⑦</sup>和高建新<sup>⑧</sup>等人的文章则赞同它是敕勒族民歌。

鲜卑族民歌说的主要证据是《乐府诗集》所引《乐府广题》的记载:“其歌本鲜卑语”<sup>⑨</sup>。但是,沈建在编写《乐府广题》时,只不过是将在民间流传已久、已翻译成汉语的《敕勒歌》列入“杂歌谣辞”之中,鉴于《敕勒歌》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北朝期间,鲜卑语是北朝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沈建认为歌曲当时是用鲜卑语演唱的。分析“其歌本鲜卑语”这句记载,其内涵可以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是《敕勒歌》原本就是鲜卑族歌曲,所以当时演唱时用鲜卑语;二是《敕勒歌》创作之初不是鲜卑歌曲,而是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翻译为鲜卑语的,而斛律金演唱时用的是鲜卑语。就表述方式而言,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敕勒歌》最初就是鲜卑族民歌,那么沈建应该记载为“其歌本鲜卑歌”,而不应写成“其歌本鲜卑语”。由此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就是说,沈建也不能肯定这首歌曲属于哪个民族,只是承认歌曲在当时是用鲜卑语演唱的。所以,单凭沈建的记载认为《敕勒歌》是鲜卑族歌曲,论据是不够充分的。

据史书记载,高欢命斛律金演唱《敕勒歌》是在第二次玉壁大战之后,即546年。斛律金是高欢麾下威信较高的将领。《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云:“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sup>⑩</sup>。斛律金是敕勒族人,他的高祖是当时敕勒有名的部落首领倍侯利,其家族是受鲜卑影响颇深的敕勒人。玉壁战败之时,高欢军中诸贵有汉、鲜卑、敕勒各族,高欢独点敕勒将领斛律金唱《敕勒歌》,原因何在?高欢为鲜卑化的汉人,队伍以鲜卑人居多。按照常

理,高欢应该让敕勒人演唱敕勒歌曲,鲜卑人演唱鲜卑歌曲。内忧外患之时,高欢不会为达到娱乐效果,让敕勒人或鲜卑人演唱非本民族的歌曲。由演唱背景推测,让敕勒族血统的斛律金唱《敕勒歌》,意味着《敕勒歌》是敕勒族歌曲,而非鲜卑族歌曲。

《敕勒歌》的歌词中首句便是:“敕勒川,阴山下。”歌中所涉及的敕勒川的地理位置同样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另一话题。有人认为敕勒川在今内蒙古地区,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sup>①</sup>、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sup>②</sup>、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sup>③</sup>,以及高建新<sup>④</sup>、张勇<sup>⑤</sup>等人的文章。也有人认为在今山西境内,如,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sup>⑥</sup>、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sup>⑦</sup>,以及陈玉林<sup>⑧</sup>、靳生禾、康玉庆<sup>⑨</sup>等人的文章。

认为“敕勒川”在今内蒙古地区,主要是由于歌词中出现了“阴山下”,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敕勒川是在阴山附近。阴山山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井眼梁、马场梁、骆驼梁还是山脉中出名的天然放牧场所。敕勒族和鲜卑族都属于草原民族,那里富饶的旱地草场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区。认为“敕勒川”在今山西境内,立论的主要依据为“斛律金是朔州敕勒部人”,朔州曾是敕勒部人活动的区域之一,在今山西境内,那么歌曲所描述的景象可能是山西风光。还有人认为演唱地点玉壁在今山西境内,这也成为山西说的另一论据。但《北齐书》卷一《神武纪》载:“神武围玉壁以调西师,不敢应。……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sup>⑩</sup>。《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庚子,解围去”,十一月己卯“欢自玉壁归,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欢闻之,勉坐见诸贵<sup>⑪</sup>。可见斛律金演唱《敕勒歌》不是在玉壁之战期间而是从玉壁突围之后,以此支持演唱地点的山西说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无论“敕勒川”所描写的是内蒙古地区还是山西地区的景象,仅从“敕勒川”这句话,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指敕勒族的聚居地,敕勒川是敕勒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非鲜卑人的活动场所,所

以,《敕勒歌》是敕勒族歌曲。

前文已阐述过歌曲非斛律金创作,史书中又没有记载其他人与其创作有关,所以我认为,《敕勒歌》的创作是敕勒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敕勒歌》是敕勒族民歌。

民歌虽不体现作曲者的个性特征,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按照民歌分类,《敕勒歌》属于抒情性的牧歌,此类牧歌特点是“内容多表现放牧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sup>⑫</sup>。《敕勒歌》从《北齐书》记载直今,它的产生及发展与民歌特征都是相符的。

### 三

我们所看到的汉语《敕勒歌》歌词来源于《乐府诗集》,从《乐府广题》记载“其歌本鲜卑语”可以看出,它是后翻译为汉语的。曹道衡《关于北朝乐府民歌》<sup>⑬</sup>、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sup>⑭</sup>,以及宁昶英<sup>⑮</sup>等人的文章都认为,《敕勒歌》在当时是用鲜卑语演唱,或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但王汝弼《乐府散论》<sup>⑯</sup>以及日本学者小川环树<sup>⑰</sup>等人则认为,《敕勒歌》是用敕勒语演唱的。总之,关于《敕勒歌》的演唱语言学术界共存在三种观点:汉语、鲜卑语、敕勒语。

汉语演唱《敕勒歌》的主要根据是《乐府广题》中记载:“易为齐言”<sup>⑱</sup>。对于齐言有两种理解:一是北齐通用语言鲜卑语的简称;二是汉语学家所指南方和北方通用的语言——汉语。我们现在看到的《敕勒歌》歌词是汉语的,但沈建在写《乐府广题》时是根据汉语演唱的歌曲进行记录,只能证明宋代流传的《敕勒歌》是用汉语演唱的。为了解释这首歌不是汉语歌曲,沈建才在书中记载“其歌本鲜卑语”。这句话既标明歌曲的语言特征,又说明《敕勒歌》在翻译为汉语前是用鲜卑语演唱的。按照第一种解释,如果齐言为鲜卑语,沈建在“其歌本鲜卑语”后,不必再补充“易为齐言”。可见鲜卑语和齐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只有将齐言解释为汉语,这样才能与前面的“其歌本鲜卑语”相符。此外,从高欢曾用鲜卑语向士兵训话来看,高欢的军

队中应以鲜卑人为多数。当时外界传言对高欢不利,他不会让一个敕勒人用汉语演唱《敕勒歌》将自己孤立起来,这一举动既不能挽救他的军队,又不能在队伍中产生任何共鸣,所以斛律金用汉语演唱《敕勒歌》是不成立的。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云:“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sup>③</sup>高欢熟悉鲜卑语,斛律金用鲜卑语演唱《敕勒歌》高欢是能够相应和的,在此情况下在场的诸多权贵也会跟着唱。高欢让斛律金唱《敕勒歌》显然具有双重目的,既要证明自己健在,以攻破敌人“高欢鼠子,亲犯玉壁;箭弩一发,元凶自毙”<sup>④</sup>的谣言,也是要暗示大家,他仍是斛律金的领导者,并未失去军权。其用意并非让士兵在歌声中回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记载,高欢“舆疾班师……使斛律金总督大众,从归晋阳”<sup>⑤</sup>,将士们听到军令后,以为高欢可能阵亡,军中大权移交斛律金。高欢的再次出现,并让临时统帅斛律金唱歌,意在表明自己仍是大权在握,真正的最高军事领导者并未易人。高欢此举既达到对内对外辟谣又起到安定军心的作用。

作为敕勒族民歌《敕勒歌》,在产生之初应该就是用本族语言——敕勒语创作并演唱的。敕勒族是北方古老的民族,《北史》卷九八《高车传》云:“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sup>⑥</sup>。到了5世纪20年代,数十万敕勒族人归降北魏拓拔焘,被安置到漠南的广大地区,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聚居。《敕勒歌》在民众中流传已久,作为敕勒人,斛律金当然也可能用本民族的语言演唱《敕勒歌》。但是,玉壁大战时,鲜卑语已是统治者高欢重新推崇的官方语言,高欢既不是敕勒人,军队中鲜卑人又占大多数,斛律金用敕勒语演唱此歌,鲜卑化的高欢不能“和之”,所以用敕勒语演唱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看来,《敕勒歌》最初产生时可能是一首

用敕勒语演唱的敕勒族民歌,但斛律金当时是用鲜卑语演唱的,而其最后被载入史册时又被译为汉语了。《敕勒歌》经历了三种演唱语言的转变,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民歌中是少有的。《敕勒歌》能流传到今,不仅依靠歌曲自身的魅力,同时歌词语言的转变也成为它流传的重要原因。如果《敕勒歌》依然保留着敕勒语歌词,在鲜卑语流行的北魏社会中,它会因语言的关系而丧失流传的条件。不须说唐朝史书对之加以记载,恐怕北朝还没有结束它就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敕勒人将歌词由敕勒语改为鲜卑语及后来的汉语,是“适者生存”的表现。改变歌词的语种并非是忘本之举,而是将敕勒族文化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统治者及民众面前,以便其更好地流传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将敕勒族文化保留下来的目的。《敕勒歌》歌词的语言转变,一方面为其歌曲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发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敕勒人的民歌能得到鲜卑权贵及以高欢为代表的鲜卑化汉人的欣赏,他们都耳熟能详,能够用鲜卑语演唱,在流传过程中又将之翻译为黄河流域主体民族汉人的语言,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朝时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各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轨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虽然在这一民族融合过程中消失,但他们的文化已经融入黄河流域的汉族文化之中,使汉族文化从此呈现出南北方的差异。隋唐两代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中国南北对峙的分裂时期,却未能在文化上完成对中国南北方不同文化的完全整合,中国主流文化由此分为南北两支,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造成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可以说,从《敕勒歌》的流传与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各民族融合铸就新的中原文化这一过程的缩影。



注 释

徐放：《宋诗今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39 页。

陈祉斋：《阮好问诗选》，广东出版社，1985 年版，第 84 页。

王灼，罗济平校点：《髭鸡漫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 页。

沈德潜：《古诗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66 页。

①③③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 1212 页。

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3 期。

②③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43 页。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97 页。

张炯：《中国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00 页。

①⑥周蒙：《穹庐一曲本天然——敕勒歌考论》，《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①①永安：《民族大融合的瑰宝——敕勒歌的产生和流传》，《文学遗产》，1987 年第 6 期。

①②③③④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 16 页；第 16 页；第 1 页；第 150 页。

①③②④李延寿：《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 1300 页；第 1300 页；第 2171 页。

①④胡适：《国语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 页。

①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81 页。

①⑦王盛恩：《敕勒歌考辩》，《洛阳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①⑧②④高建新：《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

②⑤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

②⑥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版。

②⑤张勇：《敕勒川在哪里？》，《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②⑥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7 页。

②⑦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13 页。

②⑧陈玉林：《论雁北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

②⑨靳生禾、康玉庆：《晋阳古城之文化积淀及其历史地位》，《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①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54-1055 页。

②②《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74 页。

②③曹道衡：《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 152 页。

②④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72 页。

②⑤宁昶英：《敕勒歌考略》，《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

②⑥王汝弼：《乐府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83 页。

②⑦[日]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2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赵红梅